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

通俗文学

史料卷

- ◎ 谈文艺通俗化（1951.11-12）
- ◎ 我与《说说唱唱》（1952.1）
- ◎ 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1957.10）
- ◎ 试论当前的通俗文学（1985.1）
- ◎ 致贾平凹——再谈通俗文学（1985.3）
- ◎ 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2004.11.10）
- ◎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2004.5）
- ◎ 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2007.1）
- ◎ 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2012.8.22）
- ◎ 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2016.1）

主 编 吴秀明
本册主编 南志刚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

通俗文学
史料卷

主 编 吴秀明
本册主编 南志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通俗文学史料卷 / 南志刚
本册主编; 吴秀明丛书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308-17402-2

I. ①中… II. ①南… ②吴… III. ①中国文学—通
俗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3439 号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通俗文学史料卷

主 编 吴秀明

本册主编 南志刚

策 划 者 袁亚春 黄宝忠 曾建林 宋旭华

责任编辑 胡 畔(hlpp_lp@163.com)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於国娟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740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402-2

定 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总序

吴秀明

如果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作是当代文学的一个起点,那么当代文学迄今为止已走过风雨坎坷的六十余年历程。六十一甲子,苍黄一瞬间。在回顾和反思这段两倍于现代文学时长的历史时,愈来愈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当代文学学科构建及其研究“历史化”问题的重要性。而学科构建和“历史化”,就有一个文学史料的问题,也离不开文学史料的支撑。

众所周知,文学史料是学科构建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朴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精髓所在。文学史料意识有无确立以及实践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研究的客观公允与否,而且在学术创新和学科建设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有时候一条史料的发现,可以推翻一个结论。因此,文学史料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它也成为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具有相对较恒定的学术水准,重要原因即此;五四和民国时期的一批学人如胡适、鲁迅、顾颉刚、郭沫若、陈寅恪、陈垣、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以及嗣后现代文学领域的王瑶、唐弢等,之所以为我们留下了带有碑石性质的重要学术成果,也可从中找到解释。

应该承认,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贵古贱今”学术观念的影响,当代文学领域长期盛行的是“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研究理路;轻史料重阐释,将研究(包括立论和论证)建立在日新月异的“观念创新”而不是客观实在的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已成为主导这个学科的基本取向。这样一种研究理路在学科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如 20 世纪 80 年代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新时期”,或许在所难免,且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和深刻的合理性。因为那时刚走出“文革”,累积的问题实在太多,思想观念的封闭、僵化和滞后问题显得很突出。所以在此情形之下,人们才高度重视并彰显思想观念的解放,并将其当作时代的中心任务;而思想观念的解放,它的确也给当代文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重要的精神动力。但不必讳言,这样一种与文献史料“不及物”的研究及其空疏的学风,它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俟进入 90 年代,当人文知识分子由“广场”返回“岗位”,其所存在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为什么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热点不断,却往往旋生旋灭,很快被历史所抛弃?为什么不少著述率性而为,无章可循,其研究往往变成无征可信的个人哲思冥想?对史料的漠视,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

个“脆弱的软肋”。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代文学研究的浮躁和学科的不成熟。

针对上述这种状况,我认为在当前有必要强调和提出“当代文学史料学”问题,并藉此呼吁在这方面应该师法古代文学,从它那里寻找和借鉴有关的学术资源。王瑶先生早在1979年谈到“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时,就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悉的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①。以后,马良春、樊骏、朱金顺等还对此作过更专门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很好的建议。^②最近几年,现代文学领域接连召开数次颇具规模和影响的学术研讨会,更是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新思潮”。所有这些,对当代文学无疑是一个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我们不赞同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生搬硬套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的标准,却主张和倡扬从它们那里吸纳长期以来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和治学之道。已逾“甲子”的当代文学不是很年轻了,它留下了较之过去任何时代更为丰富复杂且永无止境的文学史料;其中有的还可堪称为“活态的文学史料”,它留存在不少当代文学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人因年事渐高,加上其他各种因素,不少史料实际处于随时可能湮灭的紧迫状态,可以说,抢救当代文学史料的工作已刻不容缓。

大量事实表明:目前,当代文学研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何将“思想”与“事实”、“阐释”与“实证”融会贯通,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所说的“思想过剩”和“理论泛滥”的弊病,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而从学科的角度讲,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也是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已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或引进某种理论“漂浮物”是远远不够的,离开了真实可信的史料,正如恩格斯早就批判过的,这样研究所得的“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③。其最终的结果,则不可避免地使“历史本质将被阉割,她的科学价值便不复存在,学科生命也随之窒息”^④。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理论阐释”尽管在现实和未来的当代文学研究中仍将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治学的方法和理念,它与“史料实证”之间的关系也不一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就目前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现状来看,我们不得不对后者投以更多的关注,并认为它应从原来比较单一的“崇拜意义”或比较抽象的价值衡估的范式中走出来,向着包括“史料实证”在内的更加多元立体、更加开放宏阔的天地挺进,并把尊重历史客体、重视实证作为治学的基础,置于首位,在研究的思路、格局、向度和方法上进行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调整。显然,这种调整对当代文学学

①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② 马良春:《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2、4期;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③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5页。

④ 《文学评论·编后记》,《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科及其研究来说,不是个别局部和枝节的修残补缺,而是带有整体全局性质的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所内含的意义,不亚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耳熟能详的“重写文学史”运动——如果说“重写文学史”运动所体现的“观念创新”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那么现在提出并强调对史料的重视则可说是研究的又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它表明当代文学研究在经过十余年的酝酿积蓄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面临着一种新的、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有望在整体学术水平和层次上有一个大的提升。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于否认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应当看到,6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我们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文学资料,包括20世纪80年代由茅盾作序、众多大专院校合作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现已出版近80种),也包括新世纪由孔范今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路文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吴秀明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当代文学卷)等。但毋庸讳言,其存在的问题是突出的,也相当严峻:一、尚未普遍形成文学史料的自觉意识,崇拜理论、迷信主义而轻视史料仍有相当的市场;二、有关的文学史料工作,迄今基本停留在收集、整理和汇编的层次,且比较简单和零碎,明显滞后于研究,真正的研究似尚未有力地展开。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当代文学史料尽管散落在各类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和各种杂志、文集、选本以及大量的拷贝、影像资料中,它们与当代近距离乃至零距离以及与政治几乎处于同构的存在,给我们的搜集、鉴定和整理带来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所没有或鲜有的不少麻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降低了人们对它的积极投入,并由此及彼影响了对研究对象更加准确的把握。但正如福柯所说的,吊诡的是,这些历史档案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杂乱无章,那些看似混乱的资料堆积,其实就是一种有意图的历史分析。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基础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所以,当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搜罗爬剔的艰苦努力,从着重“观念创新”转向重视“史料证实”,将过去被隐匿或遮蔽的材料重新发掘、整理并公之于众,他实际上已越过官方或主流所设定的界限,不仅恢复了非主流话语和声音的旺盛生命力,而且有效地“拓宽当代文学的视域,重新梳理当代文学的历史线索,使当代文学的研究不再是对现代政党的真理性及文艺政策的研究,而是可以放在20世纪中国革命多重的历史抉择,放在全球性左翼文化的总体格局之中,客观和重新检讨当代文学的历史贡献及其教训,这样的研究在今天不仅不是梦想,不是虚拟的现在,而成为一种可能”^①。这也说明当代文学史料校注、辨伪、辑佚、考订、整理、编纂,并非是简单的剪刀加糨糊的纯粹技术性工作,它内在地体现了编者的史识及其重构历史的动机。

当然,今天谈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呼吁,而应该在全面清理和总结既有成绩的基础上有一个整体通盘的考虑和实施计划。史料搜集、整理和编选不同

^① 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再叙述》,《文艺报》2006年10月28日;同时参考程光炜:《文学想象与文学国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1949—197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于通常的个体化的学术研究,它相对比较适合于“集体合作”;而当代文学史料量大面广、丰富复杂的存在,也需要动员更多的有志者共同参与,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才有可能完成。当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料之间有共同性,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里所说的独特,从纵向来看,大致可分“政治中心时代”和“经济中心时代”两个阶段;而从横向来看,大体则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或曰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

(一)一种当代文学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日趋松动和开放,虽未至禁忌尽除,却陆续公开或披露,它事实上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并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影响甚至深刻的影响。这里包括官方、半官方的,也包括民间的。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经十六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薄一波的《若干历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胡乔木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李之珪的《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周扬的《答记者问》、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王蒙的《王蒙自传》、邓力群的《邓力群自述》(未刊)、贾漫的《诗人贺敬之》、梅志的《胡风传》、周良沛的《丁玲传》、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韦君宜的《思痛录》、涂光群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邵燕祥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陈为人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郭小惠等的《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聂绀弩的《脚印》、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等等。前者(即官方、半官方的),由于出自政要亲笔或其子女亲属之手,带有政治解密的特点,不仅在“浮出地表”之初的当时格外引人瞩目(初披露时还带有某种震惊的效果),而且对当时乃至如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后者(即民间的),最具代表性的,恐怕要数被文学史家挖掘并命名的“潜在写作”,这一带有个性化的概念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它的源于史料的提出的确扩大了文学研究的内涵和外延,为当代文学及文学史研究拓展了空间。当然反过来,概念本身也富有趣味地照亮和激活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阐释,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① 此类史料主要集中于“十七年”、“文革”两个阶段,它很好地起到了“记录着特定时期现代作家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作用。^②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和说明这两个阶段文学政治化的特点尤为突出,文学在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它备受政治意识形态乃至政治权力的干预;而与之相对应,文学在备受干预的同时,也遭到了来自作家和民间或显或隐的抵制。

(二)还有一种当代文学史料,广泛存在于各类档案馆、出版物、图像音响资料,包括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手稿、报告、讲话、批示、访问、传说、口述、录像、录音、实物、照片之中,它与版本学、目录学、图书情报学、文物博物馆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以及现实的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连结在一起,牵涉收集、整理、编写、保管、出版、传播等各个环节,形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但由于诸多原因,有的露出“冰山的一角”,有的沉潜或半沉潜于历史深处尚未跃出水面,若明若暗;即使初露端倪,也有很多不确定,还留下大片

^① “潜在写作”的文学史料及其相关情况,可参见刘志荣的《潜在写作 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 邵燕祥:《人生败笔》,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 页。

空白,需要进行鉴别、整理和拓展。应该说,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更多是属于这种情况。它也是构成目前我们进行文学史料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有关这方面,笔者十年前在与他人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将其归纳为八个方面、六种表现,并认为它在搜集、发掘和整理上存在六大困难。^①这里恕不赘述。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在所有这些文学史料中,与重大政治事件关涉的文学史料的搜集相对最难也较为棘手,也许现在它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还没有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的时候,其中有的甚至长久封存在具有保密性质的档案馆,不会向公众开放。但这不应成为我们裹足不前、消极等待的理由。相反,它应成为激发我们学术探秘的内在动力。当代文学史料在当下的意义,最具意味和价值的也许就在于此。它的可行性和可能性,也只有作这样理解,才比较切实。

本丛书编选始于2010年,目的是想通过努力,为广大文学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史料,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做点实实在在的基础性的工作,同时也为构建“当代文学史料学”作必要的准备。本丛书编选,主要强调史料的立体多维及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因此,进入我们视野的,除代表性或权威性论文外,颇多的是有关的文件决议、讲话报告、书信日记、思潮动态、会议综述、社会调查、国外(海外)信息等泛文本史料。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独特之处,它可藉此将我们的思维视野投向被一般文学史所忽略了更隐秘然而往往对文学更有决定性作用的细枝末节,包括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体化体制,从这个角度对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全面系统而又富有意味的梳理和呈现。当代文学在六十多年行进过程中,自身的确已累积了相当丰沛的史料。为了回应历史,也为了现实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现在是可以而且应该考虑“史料学”的问题了,有必要编选一套与其丰富存在相谐的、有特色的大型史料丛书。这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种责任。

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料基本都是按照“作家或文体”的思路进行编纂的,本丛书基于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理解,当然也是为了打破这种传统的编纂思路和范式,有意在这方面进行尝试和探索,选择了“公共性文学史料”、“私人性文学史料”、“民间与‘地下’文学史料”、“台港澳文学史料”、“影视与口述文学史料”、“文代会等重要会议史料”、“文学期刊、社团与流派史料”、“通俗文学史料”、“戏改与‘样板戏’史料”、“文学评奖史料”、“文学史与学科史料”等11个切入点,也就是11册,用这样一种带有“主题或专题”性质的体例来编纂当代文学史料。因为是尝试和探索,缺少更多的成功经验的借鉴,也限于自身的视野和学识,肯定存在不少问题或缺憾疏漏之处,包括史料的来源可靠性与内容真实性,史料的内涵与外延,史料的层次与结构,乃至史料的分类,等等。事实上,在整个编纂的过程中,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也在进行着调整。我们恳望得到业内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将来有机会加以弥补,把它编得更好,更周全些。史料编纂,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史料的呈现寻找一个合适的“箩筐”,如果这个“箩筐”有碍于史料的呈现,那么就应及时调整这个“箩筐”而不是史料本身。总之,一切从史料实际出发,更好地还原和呈现史料,追求其多元性、学术性、前沿性的价值,是本丛书编纂的目标所在。

^① 参见吴秀明、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兼谈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五年前,也就是2010年,我曾以“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为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获得批准。在完成该项目的过程中,有感于史料的重要而又搜集不易,遂萌生了编纂一套大型文学史料丛书的动念。于是,在确定了该丛书的基本构架和思路之后,就邀请马小敏、方爱武、付祥喜、邓小琴、刘杨、杨鼎、张莉、南志刚、郭剑敏、黄亚清、傅异星(以上按姓氏笔画排序)等11位中青年学者加盟,主持各分册的编纂工作,并任分册主编。本丛书是我们大家通力合作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它可以看作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的衍生物。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期资助和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鲁东明、袁亚春、黄宝忠等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深表谢忱。曾建林、叶抒、傅百荣、宋旭华等责编,为本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他们的严谨踏实及其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在此也一并致谢。

2015年2月13日于浙大中文系

本册编写说明

通俗文学,与此相关的表达有“俗文学”、“民间的文学”、“大众的文学”、“通俗的文学”等,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和文学史叙事中,没有形成完整的叙事系列,因为“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只是“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真正关注通俗文学,并把通俗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存在而讨论的,应该从胡适和郑振铎开始。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提出了“双线文学的新观念”：“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②多年以后,胡适依然为这种“双线文学进化论”而自得：“特别是我把汉朝以后,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分成并行不悖的两条线这一观点。……这一在文学史上有其革命性的理论实是我首先倡导的,也是我个人(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新贡献。”^③“这一研究思路打破了此前按照朝代和文体讨论文学演进的惯例,找到了一根可以贯穿二千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可以说,‘双线文学观念’是本世纪中国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史假设’。”^④郑振铎更为激进地宣布：“‘俗文学’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⑤五四一代学人,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顾颉刚等,都很看重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民间资源,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对俗语、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关注。

按照这样一种理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学,应该广泛吸纳通俗文学的丰富资源,建构与通俗文学密切关联的中国文学史叙述逻辑。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五四一代学人在建构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文学的同时,毫不迟疑将近现代通俗文学打入“冷宫”,甚至要将通俗文学排除在文学之外。由《文学旬刊》改版的《文学》宣告：“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的态度来侮辱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敌’,以我们的力量,努力将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文学》1923年7月第81期)自此以后,“三顶帽子也扣上了市民通俗作家的头颅：一是封建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⑥。尽管左翼文学和延安时期,曾经提倡和鼓励进步文学家采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书写表现新时代,但“新文学”轻视通俗文学的整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③ 胡适口述，唐德刚整理、翻译：《胡适口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④ 陈平原：《胡适的文学史研究》，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⑤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页。

⑥ 范伯群：《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见《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于建设新的共和国文学艺术的迫切要求,全方位对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艺调整、改造和管控的政策文件,并按照行政化方式组织实施,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在文艺“社会主义改造”中,通俗文学所具有的“先天性”“原罪”,被有意、无意地放大。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开展了收换旧书刊活动,通俗文学的近现代资源空间受到挤压;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作品和通俗文学作家感觉到“不同待遇”,心怀委屈和不平,《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部分传达出20世纪50年代通俗文学的生存状态。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部分通俗文学作家怀着“配合”的积极心态,努力融入新时代的洪流,通过“上编模块(三) 一个新的开始:群众文艺运动”的一组文章不难看出。但是,由于通俗作家们发现的“民间”和主流意识形态所提倡的“民间”出现较大“间隙”,许多通俗文学作家有“配合”不上之叹,导致通俗文学刊物的办刊方向出现“问题”,“改造地方文艺刊物”便成为题中之义,赵树理及其主编的《说说唱唱》提供了典型案例。

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通俗文学的复苏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激荡下,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思潮,域外文学艺术资源蜂拥而至,西方畅销书、港台言情小说和新武侠小说、港台影视作品,在尚没有形成“市场”的大陆,吹起阵阵“市场”风潮,直接刺激大陆通俗文学写作。一方面是通俗文学作家队伍逐渐复苏、壮大,通俗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创刊,通俗文学的读者群与“新文学”的读者群合流,呈现出一派“振兴”景象;另一方面,基于对“通俗文艺”的固有意识,20世纪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扫黄打非”、“整顿书刊市场”等“运动”,都给通俗文学带来了一次又一次冲击。这种创作与管理、市场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构成20世纪80年代通俗文学的奇特风景。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通俗文学(特别是类型文学)写作提供了极大方便,“网络文学”作为一个热词持续发酵,通俗文学的管理机制、生产机制、传播机制和阅读机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扑面而来的“网络文学”带来了“剪不断、理还乱”头绪。当此之时,把握通俗文学现状,扫描一段时期内通俗文学景象,评估其得失成败,是通俗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必要准备。

如果追寻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路径,20世纪90年代应该是开端。尽管,在此之前,不能说没有关于中国当代通俗文学的思考和研究,但远远没有形成必要的研究格局和研究队伍。真正将通俗文学带入学术思考领域的,无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当然有赖于以范伯群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长期执着于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及其文学史定位的研究,“现代通俗文学既在时序、源流、对象、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那么当然有建立独立的研究体系的必要,而这种研究又是不能脱离现代通俗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的,是在它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索它的成功经验与失误教训,总结出它的健康发展之路,考察它是否与知识精英文学具有互补性,从而确定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庭’中的地位和价值”^①。近现代通俗文学所受到的“新文学”种种“威压”,中国当代通俗文学也同样经历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当代通俗文学如何进入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范畴,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通俗文学的性质和特点、通俗文学的批评标

^① 范伯群:《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准和方法、通俗文学入史问题,成为当代通俗文学研究的学术着眼点。在此基础上,如何认识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如果把握网络文学及其所带来的文学格局变化,成为当代通俗文学研究历史化不容回避的问题。下编第六个模块“另一种空间”选录三篇文献,分别介绍中国通俗文学在东南亚的传播、1949—1977年中国大陆翻译外国通俗文学情况、海外对中国通俗文学的研究情况等,旨在拓展思路。

在编选过程中,编选者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种文献选本,既有广阔的选择空间,也存在或隐或显的局限性。在此需要说明如下几点:

1. 本卷所选文献,均来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图书报刊。对报刊所载文献一般采取全文收录方式(其中一篇会议综述采用节录方式),图书则采用节录方式。

2. 在编排体例上,按照“上、中、下”三编次序,每“编”由若干模块构成,归入相应模块的文献以出版时间为顺序。在一编中,既体现所选文献与当代通俗文学进程的时间对应关系,又注意从“问题”出发,将能够说明某个问题的文献,集中在一起,方便读者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流程”把握。

3. 诸多学者在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中取得多方面成就,学术影响力有目共睹。但,为了体现学术研究的多点位、多层面、多声部,尽可能展示不同层面的学术成果和声音,只能忍痛割舍了许多名家名文,实属无奈。

吴秀明教授在总序中说,“从本质上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编选就是建立在对历史‘还原’基础上的一种再叙述,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再努力”,通过编选文献“还原”历史,让史料站出来“说话”,何其难哉!《庄子·秋水》有“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之说。限于编选者的眼界和水平,该选本未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敬请大方之家指正。

南志刚

2016年3月18日

目 录

CONTENTS

上 编 文艺整风政策与通俗文学管控

(一) 改造与整顿

- 文化部党组关于加强对于私营文化事业和企业的领导、管理和改造的请示报告
(1955年2月4日) (004)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和关于加强对私营文化
事业和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1955年5月20日) (011)
- 文化部党组关于处理反动的、淫秽的、荒诞的书刊图画问题的请示报告
(1955年3月4日) (013)
- 文化部关于重申从严控制新武侠小说的通知(1985年6月18日) (019)
- 陆定一在中宣部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51年4月27日) (020)
- 1955—1956年处理反动、淫秽、荒诞书刊工作及对私营书摊铺的安排改造 (024)

(二) 改造地方文艺,端正文艺方向

- 办好文艺刊物 敏 泽(030)
- 提高通俗文艺刊物的思想性
——读最近几期的《翻身文艺》与《郑州文艺》 李 晴(033)
- 为彻底纠正通俗文艺工作中的错误而奋斗 王亚平(036)
- 为什么停滞不前 天 明(040)

(三) 一个新的开始:群众文艺运动

- 《大众诗歌》创刊了 (044)
- 魏山区群众说说唱唱的经验 金 陵(046)

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	(049)
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	(051)
蓬勃开展的上海农村新故事活动·····	左 查(055)

(四) 通俗文艺期刊：《说说唱唱》及其他

我与《说说唱唱》·····	赵树理(064)
提高通俗文艺刊物的质量	
——评北京文艺刊物调整后的《说说唱唱》·····	陈 (066)
告别读者·····	(070)
通俗文学的转轨与大众审美趣味的变迁	
——《说说唱唱》的兴与衰·····	王 力(071)
地方文艺刊物的“说唱化”调整及其困境(1951—1953)	
——兼与张均教授商榷·····	周 敏(081)
《故事会》复刊后的新故事理论探讨及其生产实践	
——兼及当代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	王 姝(092)

附录：通俗文艺组织章程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	(102)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草案)·····	(104)

中 编 通俗文学的生存状态

(一) 呼声与困境

通俗文艺作家的呼声·····	木 杲(110)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通俗文学的生存状况·····	李 松(113)
十七年期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	张 均(119)
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文艺调整和通俗格局的建构·····	肖 进(126)
“文革”期间的手抄本通俗小说研究·····	王 璐(137)

(二) “现状”扫描与评估

- 试论当前的通俗文学····· 鲍 昌(148)
- 论当前通俗文学····· 姚雪垠(155)
- 边缘耀眼：中国通俗小说 60 年 ····· 汤哲声(169)
- 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
——山东大学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学生活”的调查····· 温儒敏(202)

(三) 学术会议综述

- 90 年代：通俗文学的机遇和挑战
——1995 年当代通俗文学研讨会纪要 ····· 阿 丹(210)
- 金庸：从大众读者走进学术讲坛
——杭州大学金庸学术研讨会综述····· 鉴 春(215)
- “古今通俗文学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王 立 王莉莉 刘芳芳(223)
- “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关系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
····· 范伯群 等(229)

下 编 通俗文学理论建设

(一) 雅与俗：通俗文学的性质和特点

- 谈文艺通俗化····· 老 舍(256)
- 通俗话剧的来历及其艺术特点····· 赵铭彝(259)
- 致贾平凹
——再谈通俗文学····· 孙 犁(262)
- 论通俗文学的范围、价值及其与雅文学的关系 ····· 梁志诚(264)
- 通俗小说的流变与界定····· 孔庆东(274)
- 俗文学研究的精神性、文学性与当代性 ····· 陈平原(285)

(二) 边缘与主流：通俗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 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 范伯群(290)

“革命通俗文艺”文学史论断的批判

- 兼论当代“红色大众文艺”的特殊形态……………刘起林(301)
-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构”的几个问题……………刘 勇(308)

(三) 批评理论：通俗文学批评标准与方法

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学术规范的几点质疑

- 兼与汪应果先生商榷……………李 玲(320)
- “权威批评话语”在通俗文学批评中的尴尬……………赵科印(324)
- 论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的语境和批评标准
- 以近十年中国通俗小说创作为中心……………汤哲声(330)

(四) 金庸及其意义

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

- 在杭州大学“金庸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钱理群(340)
- 金庸小说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刘再复(346)
- 我看金庸……………王 朔(352)
- 金庸致《文汇报》编辑部的回信……………金 庸(354)
-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严家炎(355)
- 金庸武侠小说与地域文化现代性构建
- 兼谈地域文学在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应对策略……………吴秀明 黄亚清(361)

(五) 网络与文学

- 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欧阳友权(372)
- 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王晓明(388)
- 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邵燕君(403)
- 电子化文学史料的内在形态与知识谱系……………吴秀明 李一帅(414)

(六) 另一种空间

- “种族、环境、时代”：中国通俗文学在东南亚土生华人中传播的重要原因……………莫嘉丽(430)
-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
- 共和国首 29 年对外国通俗文学的翻译：1949—1977……………王友贵(436)
- 通俗文学的政治
- 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之一……………季 进(444)

上 编

文艺整风政策与
通俗文学管控